

思享会

人与青山两不负：美丽中国这堂“大课”该怎么上

见地

周雁翎

讲故事不是装点思政课的『插花』

如何讲好中国故事，是新时代思政教育需要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，也是急需突破的难点之一。近年来，越来越多思政课堂尝试将故事作为载体，搭建起知识、能力与价值之间的桥梁。

传统讲故事的方法，主要停留于教师的口头灌输，学生多是被动听讲。在内容安排上，如果只是“讲一段英雄事迹”“念一段红色回忆”，就很容易与真实场景脱节。而且，在大中小学不同学段讲述的故事，可能在简单重复、相互割裂等问题。要把故事讲好，不应局限于就事论事、孤立讲述，而是要贯穿思政教育全过程，对课堂进行系统性“重构”。

在“讲好故事”方面，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进行了一些探索，改变了传统课堂上由教师唱独角戏的方法，将“写故事-现场讲故事-线上传播故事-专家示范讲故事-集体备课探讨讲故事”作为一个环环相扣的整体，运用于教学全过程中，进一步“点亮”思政课堂。

在“写好故事”方面，教师要引导学生根据教学目标确定有意义的选题。写作不仅是语言表达的训练，也是对知识的重组与内化。写作过程中，学生要主动查找资料，厘清脉络、辨别史实。这种资料整理与逻辑构建的过程，加深了学生对历史、制度和社会议题的理解，也引导他们思考讲述的角度与立场。在这一阶段，教师的角色不再是灌输知识，而是激发问题意识，提供研究路径。

“现场讲故事”是对写故事的延展，这要求学生将纸面内容转化为口语表达，对讲述对象、逻辑顺序、情感节奏有更细致的把握。学生不是背讲稿，而是要在真实场景中联系实际去讲故事。课堂不再是教师的“独角舞台”，而成为学生“展示思想”的公共空间。

“线上传播故事”是指通过短视频、音频、文章等多元形式，让师生讲述的中国故事被更多人看见和听见，走出校园、走向社会，甚至走向海外，实现“破圈”传播。

“专家示范讲故事”是通过专家和模范人物对故事的再讲述，给教师和学生提供学习的范本。在这一过程中，教师和学生在模仿中校准方向，在对比中优化路径，从而加深对“讲什么、怎么讲、讲给谁听”等问题的理解。

通过集体备课探讨讲故事的方法，有利于进一步助推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建设，打破“孤岛化”困境，将不同学段的教师组织起来，共同研讨讲好故事的方法，形成有效的“故事教学共同体”。

这些环环相扣的流程，能够给学生身份、教师角色、教学路径、课堂空间、教学理念等带来不小的改变。首先，学生从“听讲者”转变为“讲述者”。要讲述一段历史，需要秉持严谨的治学态度，回到文献、尊重史实，不断发掘其与现实的高度联系；要深入解读一个人物，就需要对其动机、所处背景和时代进行充分还原。这种课程形态，有助于推动学生主动思考、提炼观点、明确逻辑，而不再满足于“复述既有内容”。讲述本身，就是一种深度学习的过程。

与此同时，教师也不再是唯一的讲述者和评判者。在“共写-共讲-共评”的教学场域中，教师转变为学生的协作者和引导者。这种角色的转变，要求教师不仅要具备一定的知识储备和表达能力，也要在教学设计中创造学生表达的空间。与学生商量故事选题、探讨史料查证和逻辑结构等问题，成为教师日常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从“以教材为中心”到“以主题引领”，推动思政课堂构建多层次的教学结构：小学侧重情感共鸣，中学注重事实逻辑，高校则追求理论阐释与现实回应。这种“问题异讲”的结构，使得同一个故事在不同学段有不同维度的展开，从而实现内容和能力的递进整合。

例如，以“人民兵工精神”为主题，小学阶段可从历史实物讲起，建立情感认同；初中阶段可深入到人物事迹与社会情境；高中阶段可重点关注精神内涵与当代意义；大学阶段则可延展至价值体系。这种从“物”到“人”再到“事”的推进方式，能够帮助学生逐步理解叙事背后的价值逻辑。

而当故事从课堂走向现场，讲述又获得了空间上的拓展。沉浸式情境教学，可以让学生在真实场景中感知历史的温度和现实的厚重，它打破了教室空间的封闭性，使思政教育在街头场域中持续生长，不断延展到乡村、工厂、遗址、社区，转化为一种可以唤起体验、引发思考的“社会大课堂”。

这不仅增强了学生的讲述能力，也倒逼教师重新思考教学设计，从“怎样讲清楚”转向“如何激发学生想讲、能讲、愿意讲”。不少教师开始主动打破“教师中心”的讲授模式，尝试通过角色扮演、项目驱动、任务协作等方式激发学生的表达动力。故事的主题也不再仅限于历史英雄人物，而开始涵盖普通工人、乡村医生、青年创业者等具有时代代表性的角色，使故事更贴近学生的日常生活。

“讲故事”既是一种表达训练，也是一种价值建构。在一次次口语化讲述中，学生用自己的语言去说理、论证、辩驳，讲述的过程便是价值澄清的过程。而在故事被他人倾听、反馈、认可的过程中，又完成了情感共鸣与身份认同的重构。教师也由此成为情感共建的桥梁，在“讲故事”与“讲道理”的融合中，完成育人职责。

更深层的变革，则体现在教学理念的更新上。当思政课从“结果导向”转向“过程深化”，教师不再以“是否记住知识”为唯一评估标准，而更关注学生在故事创作与讲述过程中的理解力、共鸣度、逻辑性和责任感。思政权力结构也在悄然调整，师生关系转向“并肩同行”，课堂走向“多元共鸣”，教育目标从“答对问题”拓展为“提出问题并尝试回答”。

故事不是装点思政课的“插花”，而是重构思政课堂的抓手。在故事的讲述中，思政课有了更情感温度、历史厚度和现实触感。“讲故事”不只是一个方法，它正在成为一种教育哲学。

(作者系山西大学特聘教授)



浙江农林大学举办生态嘉年华，师生沉浸式体验生态文明。



中国矿业大学师生开展环境地质野外实习。

受访者供图

识科普”？对于不同专业的学生，如何通过课程思政讲好美丽中国的故事？

王群：思政课程中的生态文明教育更应引导学生思考“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本质是什么”“生态保护背后的伦理责任如何体现”等根本性问题，还可采用“问题式教学法”激发学生深度思考。比如，围绕“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”这一热点，抛出“电池回收后，污染如何解决”的矛盾性问题，引导学生开展研讨，在思维碰撞中树立辩证的自然观。此外，可以结合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“天人合一”思想，为生态文明价值提供理论支撑，让学生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时代需求，更是文化传承与理论创新的必然选择。

对于不同专业的学生，则需要结合学科特色，将生态文明理念有机融入专业教学，实现“专业授课+价值引领”的双重目标。比如，对于环境工程专业，可结合典型工艺及技术案例，分析生态修复过程中蕴含的创新精神与责任担当。对于经济类专业，可剖析“浙江余村从矿山经济向生态旅游转型”的案例，解读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经济逻辑。专业嫁接式教育能让“美丽中国”叙事既有学科深度又有情感温度，使学生在解决专业问题的过程中自然建构生态文明价值观。

张旭：将生态文明教育深度融入思政课，实现从知识传递到价值观念塑造的跃升，需以中西方环境治理对比为镜鉴，以生态文明本质差异为理论锚点，以青年创新实践为价值载体。与一些西方国家将生态环境问题异化为金融工具不同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明确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、关系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。这种根本性差异为思政教学提供了深刻的启示。比如，可以通过拆解“洋垃圾”禁令引发的国际博弈与“光伏援非”的实践案例，激发学生对于全球生态正义问题的思考，深入理解中国方案所蕴含的公平性与责任感。

同样，青年环保实践是生态文明价值观念塑造的生动载体。校园低碳博主通过创作对抗消费主义的短视频内容，将“减塑”等理念转化为青年亚文化符号，展现了流量时代的责任传播；二手交换市集，让大学生亲身体验“使用而非占有”的新消费伦理等。借此，思政课可深入解码环保理念的年轻化表达，让生态文明不再只是课本里的概念。

针对不同专业学生讲好美丽中国故事，需以专业视角切入生态议题，将学科知识转化为生态文明价值观的认知载体，实现从“专业课堂”到“思

政育人”的无缝衔接。比如，可以引导医学专业学生论证健康中国与美丽中国的同构性；鼓励艺术专业学生探索并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让美不仅是形式上的表达，更是对资源伦理的一种重构，用好的设计赋能“无废城市”。总之，美丽中国建设没有旁观者，每个大学生的专业知识都可以成为改变世界的绿色杠杆。这正是课程思政的更高境界：在传授技能中塑造价值，在解析中国中定义未来。

朱宏斌：生态文明教育开展得如火如荼，很多学校结合自身资源优势和学科特色，创新教育理念和模式，取得了显著的效果。但目前的生态文明教育还存在一些不足。从内容来讲，主要是同质化、碎片化、表层化的问题，甚至成为简单的“环保知识科普”和“生态观光游”，存在一定的形式化、走过场现象，这与生态文明教育的宗旨和目标相差甚远。要把生态文明教育真正融入教学，实现价值观念的塑造，关键要在融会贯通上下功夫。一是紧扣立德树人这一教育的根本任务，将生态文明教育贯穿育人的全过程、全方位；二是要凸显生态文明教育内涵，梳理出凝练的生态文明教育课程逻辑体系；三是要体现生态文明教育的“深”与“活”，立足当代大学生的学习特点和现代传媒发展趋势，注重激发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探究性，真正使生态文明教育兼具教育性、研究性、体验性、实践性等多重特质。

主持人：暑假将至，一些高校将生态文明的课堂搬到山水间，您认为如何将自然这本“书”与校园课堂有机结合？

张旭：将生态文明课堂搬到山水间，绝不仅是场景的物理位移，更是通过结构化教学设计，让自然成为激活理论认知、催化价值认同、驱动责任行动的“活态教材”，引导学生在山水间读懂中国，构建“个人-国家-文明”的意义之链。

当学生在黄河三角洲亲手触摸因淡水补给恢复而新生的湿地淤泥，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听到远红外相机传来的虎啸，在千年古柏的年轮里读到气候变迁的密码时，他们触摸的不仅是自然，更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命线。这种教育追求的本质，是让青年在山水间完成三重觉醒：首先是个体觉醒，即从“环保旁观者”变为“终身责任人”，比如知悉随手关灯关联着青藏高原冰川存续；第二是专业觉醒，即悟透所学知识在美丽中国建设中的价值，比如建筑师的环保设计、工程师的清洁技术皆是文明迭代的绿色杠杆；第三是工程师的使命，即理解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——没有青山常在，何谈大国崛起？

唯有如此，“山水课堂”才能超越形式主义，

师者

常婧：只有观世界才有世界观

心门就关上了。

她谈到了自己一个重要的教学理念——“人机区分”。机器只要输入代码就能生成结果，“它从来不会追问主人为什么输入这行代码，它不需要理由，可是人需要”。她反思，如果思政课只给学生提供结论，而不提供理由，学生们自然会觉得课程很“高”很“远”。

她也不吝表达，习惯密集型输出。“我太珍惜我的课堂了，每一分钟都有它的使命。”她将自己的上课风格概括为“走迷宫”，每一个主题都像是一个“打开一个通道，让学生走进来，我在出口等他们自己走出来”。学生们像走迷宫一样，在追问和思考中获得真正坚定的信仰，“这样的‘信’才是经得起考验的，因为每个路口的抉择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”。常常在故事里讲信仰，讲完还觉得意犹未尽，历经艰辛，最终在中共旅欧支部坚定入党的故事，她看见学生们若有所思，她相信，学生紧锁的眉头、严肃的表情，都是有思考、有感悟的表现。

课前，她给学生做“一周时评”，讲国际关系、时事；她还举办课堂辩论，探讨人工智能时代政治和科技“谁服务于谁”，在争论信息时代我们离真相更近还是更远；在一个叫“健身房”的课堂环节和班会上，她和学生聊人际关系、焦虑疏解等。她希望自己的课堂永远不脱离公共话题讨论，学生们要走出信息茧房和原本的偏狭理解，用“探索的、审度的方式”对待世界。

常婧总是强调“只有观世界才有世界观”。“维特根斯坦强调过，哲学不仅仅是逻辑论证，更重要的是提供一个看待事物的新视角。我想带给学生这样一个新视角，让学生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和追问。在这个答案唾手可得的时代，会提问是关键。”她说，“会发问的人，对答案更笃定”。

她曾问经管类专业的学生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西方市场经济体制有什么区别？大部分学生答不上来，而她觉得学生们需要站在更高的视角上理解自己的专业，“要有专业意识，但又

不能太有专业意识”。于是，常婧的备课轨迹变成了学科间的横跨、“绕路”。

刚来北京工业大学任教，她经常去旁听理工科的课，“补数理思维的短板”，理解理工科学生们不喜欢漫谈、要有明确目标导向的特点。知识要学得来，“外交、军事都得懂”，因为很多学生是军迷，“珠海航展上的战斗机比你（教师）都熟，会拉着你复盘俄乌冲突中每场战斗的得失”。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学生，她会啃下专业书，把自己变成一个“经济学人”；带法学专业的学生就又把自已带入了“法律人”的角色，不断追问正义。

在一堂面向法学专业学生的思政课上，常婧问：你们觉得一个法学生最重要的职业素养是什么？学生们每说一个词，她就在黑板上写，最后写了满满一黑板：思辨、善良、清醒、操守……有学生也是在这次课上改变了“凑合学法学”的心态。她会在课程中提醒不同专业的学生，要寻找自己的职业理想并坚定走下去。她喜欢指着校徽上的“Technology”说，我们校园里虽然有技术，但这里不是技校，别只来学技术，把大学上窄了。“你的大学你做主，这4年，学会做自己的主理人。”

“人心最重要”

教师圈流传着一句克服紧张的秘诀，“把台上的学生当萝卜白菜”。对此，常婧并不认同。这位“迷言建造师”有野心：不把课堂设计得“千人一面”。她说，自己上课时会把每一个个体及其背后的家庭当作“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”，试图通过学生的专业、性别、爱好、成长轨迹来理解他们的话语体系。“画群像，更要画个像。”她告诉来探讨教学的年轻教师，这种理念也是她从教7年还能保持激情的原因，每个学生都是全新的、不同的。“他们带着独一无二的心迹进来，审视着你的三观，观察着你的为人，怎能不战战兢兢、如履薄冰，怎敢不交付最大的真诚？”和记者聊起教育使命感，常婧经常忍不住用反问句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见习记者 陈宇龙 记者 任冠青

在北京工业大学，常婧老师每学期的思政课，常会从第二节开始突然变得“抢手”：教室第一排的座位要靠抢，之后的上座率、抬头率也居高不下。有学生带着专业课作业进来，但最终还是没翻开。有一回，连一个日常在宿舍打游戏、睡觉的男生也跟着室友来上课，身边人觉得这“太新鲜了”。

与之形成反差的，是每逢第一堂课，100多个学生只是随课上上课，习惯性地扎堆挤在后排。用常婧的话来说，第一节课只有一个“不过分”的目的：改变学生对思政课的“无趣”的印象，让他们从零开始学。“扭转”的决心化作一种压力，开课前一天的晚上，他总是失眠，会在脑海中反复推演每一个细节。

这个38岁的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，负责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等几门课程。在那些辗转反侧的夜晚到来前，学生们已经通过手机教学软件收到她发来的问卷，里面是一串长问题：你对思政课的印象是什么？对一门精彩的思政课有几成期待？你还记得中学阶段学了哪些知识吗？能否在不查资料的情况下列举学3个知识点？希望本学期得到什么收获？期待老师怎么讲？当下，人工智能的发展冲击着几乎所有知识领域，她的思政课也不例外。因此，问卷中还加入了这些新问题：你有使用AI的习惯吗？用什么工具？你觉得AI的冲击体现在哪些方面？

对于课程，不少学生一开始没抱有太高期待。一个学生直言不讳：“考试难编，上课难听。”学生们都认同思政课确实有意义，而常婧要摘掉的，是另一副“有色眼镜”：不仅有意义，这课还可以上得“有意思”。

在追问中获得真正坚定的信仰

常婧是一个5岁孩子的母亲，却最警惕“妈味”和“说教味”，时常自省避免出现“好为人师的职业病”，不愿给年轻人提建议。她说，如果自己张嘴就是“你要如何”“应该如何”“我们那时候如何”，从一开始的姿态就错了，学生的